

# 1903年张謇的日本之行与其救国思想和实践的演进

周宇清

(内江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晚清危殆的局势,促使张謇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所遭受的阻遏、困苦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大势的观察、思考,使他有变革政治的欲想。1903年,张謇应邀去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繁荣昌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促使他对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多有思考,这种观感和思考验证、强化了他前已有之的立宪思想。自此他由一个实业救国者转变成一个政治救国者。此后张謇积极投身立宪运动之中,试图效仿日本立宪政体改造、拯救国家。辛亥革命后,张謇顺应时势走向民主共和。张謇走过的道路,他的所思所想,反映出晚清民国时期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一部分先进者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张謇;日本之行;救国思想和实践

**中图分类号:**K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2-0039-05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状元。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经历多次角色的转换或双重身份同时并存。在其丰富多变的人生中,暗伏着一个理念,即通过个人的努力为民族振兴赢得生机。在他的奋斗历程中,潜含有许多对日本认识的因素。1903年,张謇的日本之行和其对日本的观察、认识,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由此热心政治体制的改革,试图效仿日本立宪政体改造、拯救国家。探讨此一时期张謇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有助于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态的理解。

## 一、旅日期间对政治与实业关系的观察和思考

晚清危殆的局势,激发了张謇对国家前途命运和自身定位的思考,“谓中国须振兴实业”,而实业救国,“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于是,他决意从事实业,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至1900年前后,渐显成效。“比时即拟东游考察”,无奈“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1903年,适逢日本举办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应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邀请,定计东游日本。从农历四月底至六月初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张謇一行参观

了长崎、马关、神户、大阪、西京、名古屋、东京、横滨等地,重点考察了日本的实业和教育。

日本人“作事不苟”<sup>[1]536</sup>,“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sup>[1]538</sup>。明治维新后日本各项事业井然有序,张謇对此印象深刻,其中对日本政府在日社会事业中的作用多有关注。

五月初二日,张謇参观博览会。举办博览会的目的是彰显一个国家近期的实业成就,同时与别国进行科技文化的交流,取长补短。日本政府多次支持民间农工实业会,富有成效。此次博览会,日本准备充分,所列物品门类繁多,展品丰富。而偌大的中国只有江苏、湖北等六省制送展品参展,且是各自为政,“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所陈列的不少为古旧物品,“若移置中国博物院差不倍耳”,而真正的“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的物品却没有参展,张謇感慨“劝业以开来,而此以彰往”<sup>[1]539</sup>,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参展旨趣高下立判。

日本人办工厂、兴实业得到政府资助,“日人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

收稿日期:2019-07-01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与中国局势的变迁研究”(17SA0068)

作者简介:周宇清(1974—),男,安徽肥西人,历史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是”<sup>[1]542</sup>。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无疑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企业发展了,经济繁荣了,国家自会强盛。“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sup>[1]540</sup>。“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sup>[1]542</sup>。当时的中国在这方面差之远矣,张謇兴办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经画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sup>[1]536</sup>。当初办通州垦牧公司之时,“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抗拒挠乱者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sup>[1]540</sup>。日本人办实业的国家支持力度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企及的。

此事并非个案,在函馆考察,张謇得知华商将物品运往中国,每年需运费十五万,“因劝合力创汽船自运。各商逡巡逊谢,言先恐华官不许,即许亦不保护。日本邮船会社开创至今,国家补助未绝也”。张謇惊叹“畏虎者谈虎而色变,孰使吾海外辛苦之民变色至于此?又念余遵朝旨兴扬通内河小轮,犹有阻抑者,彼商人之寒心何怪焉”<sup>[1]556</sup>。

不同的政策导致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态势,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倾向。“日本自改法,通国听外人居留,待华商与欧美无异。各商在此,犹得与欧美人权势平均,若回华甚涩缩矣。闻之心动”<sup>[1]556</sup>。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策开明,华商在日本比在本国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山东日照有一农民许士泰,“状朴拙,口呐呐”,在烟台做苦工,为人所轻视,光绪元年,被日本商人招到北海道垦殖,由于其勤力耐苦,“十余年如一日”,受到日本政府的表彰,他自己也闯出了一番天地<sup>[1]556</sup>。张謇由此感慨:“今中国人中,若许士泰者何限,十倍千万倍于许士泰者亦何限,其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当其一詈而一嘲,十倍千万倍于许士泰者也。”<sup>[1]557</sup>张謇进而联想到其他地方的华人华侨:“抑闻闽粤之人佣工经商于南洋诸岛间者,以数十百万计,问闽粤有司有可稽之籍否?一许士泰又宁足论其幸不幸哉?”“合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如北海道者何止百倍,人民之可募而移者何止千倍,使尽如此经营,于富强乎何有。抉其病根,则有权利而昏惰者当之矣”<sup>[1]557</sup>。

考察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时时触发张謇对政治与经济社会关系的思考。落后国家发展建设,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日本“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sup>[1]545</sup>,所以才有明治维新后日本

的迅速崛起。至于具体的事务,“凡事入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不似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sup>[1]545</sup>。就官、商关系而言,“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日本的“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sup>[1]548</sup>。

六月初四日,在此次考察行将结束之际,张謇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政治与实业、教育的关系是:“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时代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张謇自觉应当担负责任:“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sup>[1]565-566</sup>“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sup>[1]566</sup>士大夫是国民的中坚,他们有知识、有财力、广交际,应该在民族危机的时刻勇敢地承担民族振兴的大义,而最根本的是政治上走上正轨,“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sup>[2]257</sup>,此后张謇一直持此观点。

## 二、日本考察归来后对立宪认知的深入

戊戌、庚子之变后,张謇认识到“非改革政体不足以系人心而回天命”<sup>[3]281</sup>。其时,“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sup>[4]565</sup>。张謇赞成君主立宪政体而不认可革命,他认为“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只可从精神法度改革,则整理自易”<sup>[2]606</sup>。立宪持论公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sup>[4]565</sup>,“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sup>[1]1021</sup>,“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sup>[4]565</sup>。在张謇看来,立宪是一条代价最小而收效最佳的改变政体的路径。

自此后的十余年间,立宪是张謇目注心营的主要目标,“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sup>[1]620</sup>。欲行宪政,日本就是一个现成的榜样,早在1901年,张謇在他的《变法平议》一文中,就提出了仿日本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的主张,使得“下无不通

之情,上无不行之法”<sup>[2]35,39</sup>。日本考察归来后,日本宪政体制下的社会状貌仍萦绕在其脑际,但他“又念人民知识枯于累千百年之专制,仓卒无由以自振。乃与三数同志谋师德日之立宪,上朝下野,奔走陈说,冀幸万有一成之日”<sup>[3]281</sup>。张謇“觉得立宪固然要政府先有感悟,主持实施;然而人民也得要一齐起来发动,先用一般团结研究的工夫。所以这一年内,见到官员友人,遇到谈论通信,没有不劝解磋摩各种立宪的问题”<sup>[5]138</sup>。

1903年12月30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縶。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sup>[1]577</sup>

1904年4月,张謇代张之洞、魏光焘拟《拟请立宪奏稿》。6月刻印《日本宪法》,并设法送达内廷。慈禧览后召见枢臣时谕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sup>[1]1020</sup>八月,“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送铁侍郎良,与谈宪法”<sup>[1]1020</sup>,并将这些事关宪政的书籍分送政要。张謇深望政界、学界“能外集良法,内审国势,明辨而笃行之,庶几将来或有食其效果之一日”<sup>[3]218</sup>。

日俄战争尚在进行时,张謇就预见到日胜俄败的结局,并将之归结为政治体制的原因,“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联系当时中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新政”,张謇断言:“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sup>[6]67</sup>

日俄战争结束后,张謇深感“中国之患益逼”,需要革新的事情很多,然而“非通筹全局以图,则枝疏节解,必至顾此失彼”。因此,“立宪之不可复缓”,“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sup>[3]189</sup>。“我之立宪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sup>[3]281</sup>

在张謇看来,欲救艰危,只有立宪,欲立宪,亟需做的事情是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变更政体,是关系全局安危的大计。“今环球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sup>[7]118</sup>

张謇比较了欧美非澳各洲,认为这些地区“种族各殊,宗教互异,党派又复纷歧,宪法即不能尽合我用。惟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且

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大致不远,明治维新,当时亦由外侮激迫而成,其国势与今日中国亦复异地同揆”<sup>[7]118</sup>。日本宪法经由其阁臣“历游各国,考察制度,斟酌损益,慎之又慎,经十年而后成,用以尊主庇民,巩固国势,成规具在,似可采择施行”<sup>[7]118</sup>。

张謇详细论析了实行宪法的益处。“宪法行,则全国人民皆与国家有共戚均休之义,理财、练兵、兴学其事易举。”<sup>[7]118</sup>“宪法行,则上下志通,官吏自无从锢蔽”<sup>[7]119</sup>,有利于政令的畅行。宪法行,“事事关系全国人民,各国亦稍有顾忌,不敢轻发难端”<sup>[7]119</sup>，“足以图存而自立”<sup>[7]119</sup>。宪法行,“妄言革命”者“无可藉口,自足消融其戾气,非独目前一切虚无乱党之说不足为害,且可使其中聪明误用之才,服义归仁,转为我用”<sup>[7]119</sup>。为了打消实施宪法后“君权稍替”的疑虑,张謇论证说实行宪法“不过变咨询之少数为多数,且仍决之于上,是君权转因之益尊”<sup>[7]119</sup>。“以外邦经验之良规,成中国创行之新政,千载一时,适于皇太后皇上廓宏规而开景运,我大清亿万年有道之长,可以预卜。”<sup>[7]119</sup>归根结蒂,张謇甚望“皇太后皇上密访议复,断自宸裁,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sup>[7]119</sup>，“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张謇满怀信心地预言“日本壤地褊小,改行宪法仅十余年,遂跻强大。中国地广民众,苟及时为之,必能事半功倍”<sup>[7]120</sup>。

为了立宪,除了制定宪法外,张謇还力主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立宪国何以能之?其立法也,曰责任内阁。责任云者,以内阁代君上负责任焉耳。责任专于内阁,而君上日临而监察之。内阁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外交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观听,群倾注于内阁大臣。凡为内阁大臣者,但稍有知觉,决不能如向之持禄保位,泄踏自安。且其地处于可进可退,即有桀骜不驯之才,亦受责于举国之舆论而无所容逞。”<sup>[7]188-189</sup>国会也是宪政国家机关必不可少的机构之一,“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sup>[7]193</sup>。有国会,“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sup>[7]193</sup>。“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有了国会,“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sup>[7]194</sup>。“有国会,则对于全国为政府交通之邮;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上下相通,猜疑自泯;邦交

既正,民气自和”<sup>[7]195</sup>。

### 三、从立宪运动的推动者到倾向共和的转变

晚清最后十余年间,张謇为实现立宪主张可谓殚精竭虑,他真诚地希望以此能够消弭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减缓社会震动,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给国家民族以一线生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张謇盛赞君主立宪关系“亿万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sup>[3]186</sup>。是年底,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联合江苏、浙江、福建3省商、学界200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成员显赫,在这一时期国内立宪团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张謇在其中起主导作用。1909年,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嗣后,张謇推动、策划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为早日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奔走。

然而,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善举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积极回应,“持立宪之说十年,上疑而下阻”<sup>[7]231</sup>。诚如章太炎批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那样,这种“以君权变法”的主张,实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sup>[8]182</sup>立宪派自身没有实力,又没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妄图通过和平请愿为国家民族也为他们自己争得发展空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正是在立宪派沉湎于立宪理想的时候,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君主的无上权力。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意图,“复不更事,举措乖张”,立宪派很是失望。“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sup>[1]1026</sup>。然而张謇仍然没有泯灭对清政府的幻想,得知武昌发生革命事件后,张謇仍试图实行君主立宪。1911年10月14日,“至江宁,即诣将军铁良,说亟援鄂,一面奏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铁良嘱托说先商总督张人骏。“15日,诣张。张大诋立宪,不援鄂,谓瑞能首祸自能了,不须人援”。张謇又说“武昌地据上游,若敌顺流而下,安庆又有应之者,江宁危矣。”张人骏说:“我自有兵能守,无恐。”16日至苏州,巡抚程德全甚

赴张謇“请速布宪法开国会之议”,并要张謇草拟奏稿<sup>[1]1029</sup>。

然而,随着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清廷大势已去,“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sup>[3]287</sup>。张謇也顺应时代趋势,主张“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下”<sup>[3]287</sup>。在实现自身转变之际,张謇在给袁世凯的一封函电里详细地叙述了晚清最后时期的局势、他本人的意愿、清政府的乖戾举措和他的遭际及感受:“自庚子祸作迄于事定,前后赔款几及千兆,海内沸腾,怨叹雷动。謇时奔走江鄂,条陈利害,须亟改革政体,未获采陈,乃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迭有陈说,十不行者五六。”<sup>[3]286</sup>“自先帝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輿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枢密、疆吏,皆政府而代表朝廷者也。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謇在江苏辄忝代表,瞠目捩舌,为社会诟责,无可解免。虽日持国运非收拾人心无可挽回,人心非实行宪法无可收拾之说,达之疆吏而陈之枢密者,无济也。谏行言听之无期,而犹大声疾呼之不已,诚愚且妄。”<sup>[3]286</sup>以上正是对立宪运动失败原因的精练总结。

社会发展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是必然趋势,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必当变革。在近代中国人寻求改变国家体制的过程中,曾有两种方案,一是改良的君主立宪道路,二是革命的民主共和之路。张謇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士绅转向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兴办实业、教育过程中所遭受的阻遏、困苦,他对中国和世界大势的观察、思考,使他有变革政治的欲想。他的状元头衔、士绅兼实业家的身份,以及他对立宪与革命的认识,决定了他只能走立宪改良的道路,他在日本期间的考察、观感验证,强化了他的设想,他一度对立宪救国理想倾注极大热情,付出不少努力,但时势的发展最终改变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他也顺应潮流走向共和。

武昌起义之后一个时期张謇的倾向共和,是时局推动和其自身的遭遇使然,但随着形势的演进和他对政治体制的体认,他进而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共和政体,1920年,他在为应邀来南通讲学的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博士的介绍词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政治体制的思考:“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

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sup>[2]462</sup>“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sup>[2]462</sup>此时张謇已在思想上真正皈依了民主共和思想。张謇走过的道路,他的所思所想,反映出晚清民国时期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一部分先进者的心路历程。张謇的人生历程再一次生动地表明,民主共和道路才是适宜当时中国政情民心的最佳选择。

###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

[6]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G]//来新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Zhang Jian's Journey to Japan in 1903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Saving the Nation

ZHOU Yuq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641112, China)

**Abstract:** The perilous situ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mpted Zhang Jian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industry. He suffered the obstruction and hardship in the course of establishing industry, and he observed and reflecte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world, which made him have the desire to change politics. In 1903, Zhang Jian was invited to visit Japan. He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prosperity of Japanese society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He thought a lo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verified and strengthened his previous constitutional ideas. Then he changed from an industrial savior to a political one.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nd tried to follow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al regime to transform and save the country.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e conform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ent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His paths and thoughts reflected the mental course of some advanced people who explored the way of 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Zhang Jian; journey to Japan;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saving the nation

(责任编辑 雪箫)